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7)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 旦 大 学 中 外 现 代 化 进 程 研 究 中 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7)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第7辑)

ISBN 978-7-5325-9166-4

I. ①近… II. ①复… ②复…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3775 号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7)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5 插页 5 字数 297,000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166-4

K·2622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7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诚 朱荫贵 吴景平 张济顺 张晖明
陈思和 林尚立 金光耀 金冲及 姜义华
顾云深 章 清 熊月之 戴鞍钢

执行编辑 章 可

编者的话

本辑为《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的第7辑,主题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知识”与“观念”本非一物,但在近代西潮席卷、中国人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过程中,两者的更新与嬗变都遵循了相似的轨迹。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旧学”到“新知”的转变,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扩充和重整,而是知识在“获取、分析、传播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中的结构性重造。^①“新知”与“旧学”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前者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和生活实践的方式。因此,如果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史”研究能够成立,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应将目光仅停留在纸面的、文本的世界,而是“知识形态史”和“知识社会史”的结合,是对认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多重考量。

同样,本辑考察“观念”,也并非那种悬在空中、停留于精英思想家脑海中的“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而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很多年前曾提醒学者,以往思想史研究的重大缺点之一,就是“对于观念有不负责任、爱好而又不专精的毛病”。学者总是“草率地用一些惯用的名词,如‘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来说明某些观念,进而用一些他们所假想的起因陈说来从事解释”,所以,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研究容易显得太过“轻易”。^②对于处于剧烈变动中的近代中国而言,几

乎没有一个观念是“理所应当”的，因此相关研究也绝非轻易。今日学者大多试图重回历史语境，或从词汇、概念的角度细细审视其来龙去脉，考察语义和文本的多重关联方式；或从观念（话语）的社会效应着眼，考察诸种因素的互动。

在本辑的论文中，杨瑞松的《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选取学者大多熟闻的“四万万”这一词汇，研究它如何从一个单纯计量人口的数字，化身为国族认同的关键性符号，细细钩沉近代围绕着“四万万”的各种民族、国家和道德想象，极为精彩。该文提示我们，类似“四万万”之类的想象性话语，当它们进入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成为与“我族”粘连的重要符号后，实际上发挥了限定民族国家“边界”的重要作用。而无论是诸如“一盘散沙”之类的负面描述，还是民国成立前后“五族共和”这等重塑政治认同的话语，都与“四万万”话语本身划定的问题边界相关，在各种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紧张性。

类似的，承红磊的《“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研究的是近代另一重要词汇——“society”如何进入中文语境。尽管今日国人都已接受“社会/society”的意义对等关联，但这种现象并非“从来如此”。以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清末“群”和“社会”这两个译词之间的并行和竞争，而该文将目光置于更早期，选取《万国公法》和《佐治刍言》这两个翻译文本，讨论其中“国”“众”“会”等译词背后的思想资源和概念理解问题，别具一格。

在对近代中国新词汇、新概念的研究中，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时人运用本土传统中的资源来解释全然来自欧美的新概念，这在当时可能便于理解和传播，但往往也因此掩盖了中西两种概念之间本质性的差异，由此使得后来学者的不断清理变得相当必要。姬凌辉《风中飞舞的微虫》一文就关注“细菌”这个“微小”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该文首先考察传统医学中“因虫致病”说以及

“虫”“蛊”等相关概念,然后论述“bacteria”一词进入中文语境的过程以及“细菌致病说”如何开始传播。作者敏锐地指出,毒虫和疫气知识在近代成为国人接受细菌概念的重要桥梁,呈现出知识传播中独特的一面。

同样关注身体和医学,周永生《蝌蚪避孕:20世纪50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一文讲述的是共和国建国初期“吞食蝌蚪以避孕”这种特别医学观念流传的故事。这种今日看来不免怪诞的行为背后,是50年代扶植中医、发挥中医效用的大观念背景。而这一流行现象折射出来的,则是那个时代国家工业化、人口快速增长、女性节育需求、民众猎奇心理以及中西医知识普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该文通过细致梳理,展现了在建国初期国家推行“科学化”的宏大话语下,民间医疗实践的复杂进程,引人深思。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也在50年代开始流行,但这个来自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词汇自上而下地、迅速被大规模运用于政治运动当中,并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烙下深刻的痕迹,乃至后来它成为20世纪少见的中共官方刊文改正译法的概念。许浩和章可的《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一文从《哥达纲领批判》的早期译文入手,细细追溯“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何时出现,与哪些知识背景相关,并选取何思敬这一关键人物讨论译名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态度变化。文章揭示出“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张春桥名文问世以前,它就已经具有了很强的阶级批判性。

重构一个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并不比重构一个时代要容易。舒铁的论文聚焦于清末民初湖北的一名普通士人金永森,从他的代表作《西被考略》入手开始这项“重构”工作。金氏对中国传统典籍相当熟稔,基于此,他对“西学中源”的解释也多有奇崛之处;而他运用《山海经》的记载来附会西方诸地域,则显现出在清末

“万国竞争”的大格局下,许多普通士人仍然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世界格局想象坚守抱持。“知识史”的复杂和丰富性,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除了六篇主题论文,本辑还刊载三篇译文。海德堡大学顾有信教授的论文研究梁启超对德国思想家费希特的翻译,以及梁氏对人之“天职”观念的创造性诠释。而汉堡大学冯凯教授的论文研究中文“进步”概念的生成,以及它和“进化”概念之间的纠葛,他审慎地区分了“进步/进化”和“progress/evolution”的语境差别。两文史料详尽,精义迭出,颇能代表欧洲(德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水平。此外,编者还选取了哈佛大学高登教授的《什么是思想史研究》一文译出,该文从方法论着眼,阐述了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与观念史、哲学、政治理论、文化史、社会史之类的差异和联系,对我们思考中文语境中“思想史”的定位,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本辑还有两篇精彩的史料考证文字。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多次专题学术工作坊,其中许多与近代中国研究相关,本辑选录其中两次工作坊的综述,以便读者了解相关信息。最后依照惯例,附上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英文文献目录。

集刊此辑最终编成,离不开作者们的支持,以及方方面面的帮助。在此谨向所有作者、译者和帮助本辑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编者

2018年冬

① 有关这个过程的各阶段,可参看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因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第一部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美)史华兹著,张永堂译:《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6页。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 专题研究 ·

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	杨瑞松 1
------------------------	-------

“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

——以《万国公法》和《佐治刍言》中的翻译为例

.....	承红磊 51
-------	--------

蝌蚪避孕：20 世纪 50 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	周永生 77
---------------------------------	--------

风中飞舞的微虫：“细菌”概念在晚清中国的

生成	姬凌辉 112
----------	---------

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

(1922—1958)	许浩章可 141
-------------------	----------

清季普通士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

——以金永森及其《西被考略》为中心	舒铁 173
-------------------------	--------

· 域外专论 ·

翻译《人的天职》：梁启超、费希特与民国初年的

政体讨论	顾有信著 夏静译 章可校 194
------------	------------------

中文“进步”的概念史

..... 冯 凯 著 孙 煜 译 章 可 校 222

彼得·高登：什么是思想史研究？ 章 可 译 257

· 史料与考证 ·

《李鸿章全集》所载致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

勘误(上) 张晓川 287

《刘节日记》微疵集 张求会 332

· 研讨综述 ·

“报刊与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再生产”工作坊综述 李稳稳 347

“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空间生产与知识转型”

学术工作坊综述 王志通 357

· 附录 ·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文部分) 李稳稳 370

· 专题研究 ·

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

杨瑞松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四万万人”如何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渐次演化成为近代中国的国族符号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经由晚清时期维新思想的运用，尤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论述的催生下，此“数字化”描述晚清中国人口的方式，配合所谓“同胞”的血缘亲属想象符号，形塑出具有高度同构型意涵的国族认同。“四万万”人口符号同时也标示中国作为国族国家，脱离传统天下秩序的新世界观的重要转变。但另一方面，为了强烈激发国族意识，四万万的国族想象也经常以全盘负面形象如“四万万禽兽”的意象出现。最后，本文也检讨此种人口想象模式和其他近代中国人口想象意象，例如“一盘散沙”“五族共和”等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潜在的紧张性。不断出现在近代中国语境的“四万万人”符号，不仅扮演了如 B. Anderson 所描述的限定国族国家边界意识的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也已经很“自然”地嵌入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国族意识中。藉由去自然化此现象和历史化此符号，详细分析、比

较各类有关运用“四万万”符号的文本,本研究试图更清楚地解析“四万万人”符号产生的历史过程,以及发挥了哪些想象的力量从而形塑了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特定风貌。

关键词:四万万人,同胞,散沙,五族,梁启超

杨瑞松,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②

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③

一、从“新名词”到关键词

从1952年到1989年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小学三年级教科书中,收录着一则有关“蒋介石爱国反日”的历史小故事。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

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④

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出现于毛思诚（1873—1939）在 1937 年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⑤并且也收录于由王升（1917—2006）所编的《我们的蒋“总统”》一书中。^⑥当然，各类有关蒋介石生平介绍的书籍，包括日本人古屋奎二在 1970 年代所编写的《蒋“总统”密录》，^⑦也都收录了此则故事。^⑧对于一般大众而言，由于这个故事出现在小学教科书的时间如此久远，可以说成长于戒严时期之几个世代的台湾人，应该都对于此图文并茂的故事有深刻印象。

本研究无意去探讨该故事的真伪，而是引用此流传性甚广的故事以彰显所谓“中国有四万万人”的说法和意象，在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中所扮演的鲜明角色。在上述故事中，当日本教官以四万万之众描绘中国人口，并将其丑化为四万万的寄生虫时，不管是年轻的蒋介石（在 1906 年）或者是阅读此故事的台湾青年学子（在 20 世纪下半叶），都“很自然”地立即明了他是针对中国人的集体形象加以羞辱。换言之，从 20 世纪初期以降，“四万万”的全中国人口数字早已经深入人心，“四万万人”“四万万之众”“四万万同胞”或“四万万中国人”等表述方式出现在各类型有关近代中国意象的文本中；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前半叶，更是成为近代中国人在界定想象“我族共同体”人口疆界的代表性数字和符号。

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来解析此人口

数字,我们将会发现其符号形成的复杂历史性以及其暧昧性。首先,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而言,或许中国有“四万万人”的说法,是极其自然而且马上能够意会的描述,可是在19世纪末时,这样的说法都还是极其新鲜,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荒诞不经的表述方式。例如在晚清反维新派的论著中,收录于1899年出版的《翼教丛编》的“湘省学约”,即是将“四万万人”和“热力”“支那”“以太”“黄种”等字眼,并列为“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造成阅读者“阅不终篇,令人气逆”的现象。^⑨由此可见,“四万万人”在现今的中文语境中,对于大众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但在一百多年前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次,从单纯的字面意义而言,“四万万人”原先不过就是一个人口数量的表述符号;但是从晚清以降,它却渐次演变成为一个鲜明的国族符号,成为一个强调彼此命运相结、休戚与共的国族共同体的代号。在传统中国政治论述中,往往以“苍生百姓”“黎民黔首”“天下臣民”等广泛性字眼描述帝国体系下被统治的人民;相对而言,“四万万人”符号以明确的数字取代了上述泛约性字眼,从而以实际的数目划定了19世纪以降在国族国家(nation-state)的新世界体系中近代中国国族的人口疆界。^⑩更重要的是,“四万万人”和其衍生的字眼等符号,不断出现在晚清时期强调唯有万众一心、全民总动员,方能和世界其他国家竞存之的“合群”论述中。这些名词(尤其是“四万万同胞”)更是在晚清国族主义论述的挪用下,成为欲化四万万被统治之“臣民”,为四万万具有参政自觉意识之“国民”的思想论述中,召唤每一个成员成为国家的主体,并产生与国家兴亡荣辱与共之认同情感的重要符号。^⑪简言之,“四万万人”从原本不过是描述晚清帝国统治下的人口数字,最终转而为国族建构论述中具有兄弟之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涵之国族代号。本文开端引述的谭嗣同(1865—1898)诗作中的

“四万万人齐下泪”意象,即很明显地展示出此种共同体想象的符号性质的情感要求——清帝国甲午败战的后果,不再只是一家一姓的清王室或是清政府所面对的政治困境,而是所有四万万的国族成员理应感同身受的集体耻辱。

诚如 Michael Billing 所指出,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过程的一个关键议题,正是作为国族的“我们”(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构的,而这个被建构的“我们”又被赋予何种意义。^⑫本研究所欲探讨、分析的主题即是与“四万万”相关的符号在近代中国国族认同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基于“四万万”符号的中国国族认同因而具有哪些特色。我将检视“四万万人”想象论述发展的来龙去脉,检视它如何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不再仅是讨论人口、税户等财政经济议题时才会出现的关于人口的字眼,而是伴随着方兴未艾的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和国族想象论述发展,成为界定中国从过往专制君主的“天朝中心体系”,转化为以“四万万人”为主人翁的“万国中之一国”之重要国族符号。换言之,“四万万人”从一个清帝国统治下关于人口的粗估数字,在晚清时期尚被保守派人士视为是“幽渺怪僻”的新名词,却渐次演化为近代中国国族想象论述中的关键词,代表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要求的符号,更时常和正面或反面的集体意象连结,扮演召唤群体意识、激发共同情感、鼓吹国族认同的重要角色之复杂历史变化过程的解析乃是本研究的主题。同时我也将探讨此“数字化”的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如何配合所谓“同胞”之血缘亲属想象符号,来链接形塑近代中国国族的高度同构型,我们将会发现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的想象中,新旧因子的混同与挪用的现象。最后,我也将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于“四万万”的国族想象和其他近代中国集体想象意象,例如“一盘散沙”“五族共和”等,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潜在的紧张性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二、从人口数字到国族符号

“四万万”作为对于清帝国 19 世纪末时所统治人口数量的描述有其一定的历史依据,诚如薛福成(1838—1894)在 1891 年间所言:

今天下诸国人民之众,中国第一,英国第二,俄国第三,中国人数在四万万以外,大约四倍于英,五倍于俄;余因考二千年来,以汉平帝、元世祖、明神宗为户口最盛之世,然户多不逾一千二三百万,口多不过六千万以内而已。国朝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民数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六万有奇,较之康熙年间,已增十三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除台湾未报外,共得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余人,则阅时未六十年,又增一万一千九百余万人矣。自粤、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人数几耗一万万有奇,迄今荡定之后,又已休养二十余年,户口颇复道光季年之盛。^⑬

从引文中可见,薛福成认为他当时所处的 19 世纪末时清帝国所统治的人口数量,应和道光年间的人口统计最高数(四亿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余人)相若,这是他以其间的战乱和人口增长趋势两项正负因素相互抵消后的估算结果。而薛福成也依据此估算的人口数(四万万以外)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强调中国乃是世界人口数量为首的国家。梁启超(1873—1929)在其于 1902 年所著的《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也提及“西人之称我者,动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数也”,同样提及道光年间的数据为四百余兆的流行说法之历史渊源。^⑭事实上,林则徐(1785—

1850)于1838年时论及鸦片所造成的经济财政祸害的文章中,也确切提到道光年间人口总数逾四万万。林则徐以吸食鸦片每人每年需费银三十六两,而做出如下的估算:“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裁,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⑮

由上述例证可见,就人口统计数字而言,“四万万人”并非一项晚清时期无中生有而发明之术语,而是依据道光年间的人口总数所推算出的数字,在晚清时期的论述中已有相当程度的流通性。王韬(1828—1897)在1883年所写的《欧洲各都民数》一文中,也言及中国总人口为四百余兆(亦即四万万多)而冠于全世界的现象,并且强调中国富强之道正在于要能善用其众:

四大洲中,林林总总,当不知其凡几,而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则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国而计之,版图户口亦以中国为巨擘。俄罗斯方七十二兆里,户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户口二百零九兆。合众国方三十兆里,户口三十二兆。中国方五十兆里,户口四百兆。是则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顾有众尤贵能善用其众,则富强之术、保卫之方,可不亟讲也哉。^⑯

从薛福成和王韬的论述脉络也可以看出,此四万万人口数字已成为晚清有识之士将晚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时的一项重要数据。而一般论者为求论述方便起见,往往取其整数(四万万)以言之,例如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1892年所著的《纺织机器图说》一文中,提到中国的人口数时即如此表述:“于二万